

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与变迁

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摘要]崤函古道是我国古代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东西干道中最为崎岖和重要的一段,兴盛于周、秦、汉、唐时期。作为我国古代“襟带两京”长安、洛阳的锁钥,中原通关中、达西域的东西干道上的咽喉,崤函古道在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沟通中原与关中和西域等方面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有关崤函古道的发展和路线走向,已有学者作了梳理,但仍不乏有待细化和深入研究的地方。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考述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及其变迁。

[关键词]崤函古道;交通线路;变迁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007-15

崤函古道是我国古代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东西干道中最为崎岖和重要的一段,作为我国古代“襟带两京”长安、洛阳的锁钥,中原通关中、达西域的东西干道上的咽喉,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古代东、西两京,把关中与关东(山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联系我国和中亚的桥梁,在古代都城地域结构和运作空间以及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历史文献对崤函古道有许多记载,但对其线路及沿线经地的记载却较简单、笼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严耕望、王文楚、辛德勇及胡德经等学者对崤函古道的路径及其变迁做了大量论述,^①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复原方案,对于阐明这条古道的历史面貌,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就崤函古道的总体状况而言,其复原方案仍有待细化和深化。因此,崤函古道仍有讨论的余地。近年来,笔者先后多次前往该道沿线及若干支道进行系统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古代遗迹和资料。这些遗迹和资料,或与崤函古道有直接关系,或可间接证实崤函古道的运行状况,或可作为理解崤函古道的背景资料。本文在总结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对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与变迁情况予以综述。

一、崤函古道的形成与发展

崤函古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其特定含义,它是指先秦以来至民国时期西安(长安)、洛阳之间主要在

今河南三门峡地区及毗邻地区境内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其东端分别始于古都洛阳西出道口的新安县和宜阳县,西至关中盆地东侧门户的陕西潼关。因其沿线主要穿行于崤山之中,所经之途,山势高峻,谷深道曲,又有号称天险的函谷关,故而被称之为崤函古道。丝绸之路开通后,崤函古道又与其他通道组合,由原来的境内通道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故而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道。

崤函古道东西全程约200多公里,中间有合有分。以古陕州(今陕县)城为枢纽,崤函古道分为东、西两段,即“函谷道”和“崤山道”。东段函谷道是自潼关进入豫西崤函地带,经阌乡、盘豆到湖城,之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稠桑到函谷关,南线经虢州至函谷关,经灵宝老城抵陕州,因其道路主要沿黄河南侧而行,又称为“黄河南岸道”。西段“崤山道”亦分南、北两条支(路)线,即“崤山南路”和“崤山北路”。崤山南路亦称“南崤道”,其路线是从陕州城出发沿青龙涧河东南行,经交口,溯青龙涧河支流雁翎关河(今安阳溪水)穿崤山,越雁翎关,沿洛河支流永昌河东南行,循洛河谷地,经洛宁旧县、宜阳北上到洛阳。崤山北路亦称“北崤道”,则是由陕州城向东,经交口,沿涧河河谷,过硤石、澠池、新安到洛阳。

现有的文字材料中,最早记述崤函古道的是《尚书·禹贡》,它说夏禹治水时,“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

作者简介:李久昌(1960~),现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古都学和区域史及文化遗产。

大坯”。有学者考证这一记载后,得出夏禹时开通了洛阳至长安的黄河走廊通道(函谷道)的结论。又根据同书《甘誓》篇有关禹子夏启伐有扈氏的记载,认为启伐有扈氏时期开通了崤山南路。崤山南路的开通则不晚于商代后期。^②这样的看法显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根据考古资料以及部分文献记载,崤函古道早期开发大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因为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开始,崤函古道地区便开始与西面关中东部的华渭地区居民、东面崤山以东的伊洛河流域的居民存在着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和交流关系,并一直持续不断。

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判断,在新石器时代,崤函地区是著名的仰韶文化发祥地和中心分布区。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崤山地区东端的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今5500~44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以最早发现于青龙与苍龙两涧河交汇处的庙底沟而得名。



图1 崤函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和交通示意图

后者又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庙底沟文化称作庙底沟一期文化或庙底沟类型,属仰韶文化中期,而晚期的庙底沟文化则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属龙山文化早期。崤函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约有200处。^③从古遗址分布图看,这些遗址多分布在黄河沿岸或附近各小支流的岸边台地上。(见图1)

尤其是此时期氏族聚落的分布密度明显在增大,各氏族聚落间的空间距离明显在缩小,并通过相互之间频繁的经济、文化接触,交流和协作等活动,使同一地区或相邻地区氏族聚落发生了群体的联合或整合。根据许顺湛先生的研究,灵宝市的71处仰韶文化遗址可分为4个聚落群:川口、铸鼎源、豫灵镇、五亩和朱阳,但因为聚落群之间距离太近,严格说各聚落群之间很难明显地断开。聚落群整合不仅从整体上扩大了氏族群的经济实力和地域势力,而且更扩大了当时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和距离,原来仅建立在单一氏族内部和有限的氏族外部的道路和交通网也因此得到更大幅

度的拓展。新的连接大区域性或流域性聚落群的道路建设和交通网络的扩张,无疑为新兴的农业经济发展和文化与技术的持续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仰韶文化曾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而在伊洛河流域,考古学家已相继发现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存,在华渭地区也同样发现有大量的此类遗存。^④从三地区文化的共性关系以及相互之间影响变异特征来看,三地文化间存在着较密切的相互交流、联系的互动关系。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编织起了大范围的分布网和复杂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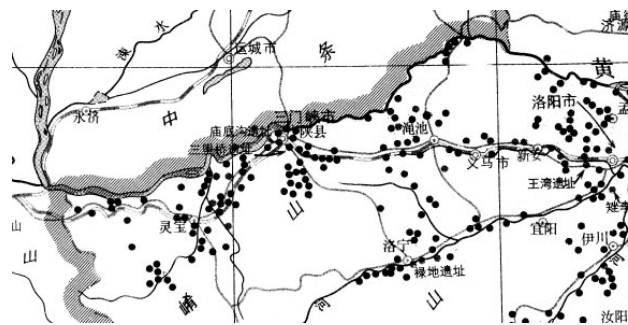


图2 崤函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和交通示意图

路线,同时亦构筑起庞大的交通网络和复杂的行近走远的大道小路。进入龙山时代,这种互动关系更加密切,不绝如缕。(见图2)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由崤函地区往东部伊洛地区、西部华渭地区的东西通道,在当时大致已具雏形和被利用。

关于崤函地区很早就存在一条与邻近地区进行交往的通道,不仅从考古遗迹上得到充分的证实,从部分古代文献中同样可以得到有力佐证。中国最早记载行走神话故事的《山海经》一书中录有“夸父追日”传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则神话故事可能是反映了中国最早的史前民族的迁徙活动。或认为“夸父追日”很可能正是反映了一支源自西北的远古部族所进行的溯河、渭而上的迁徙活动。部族迁徙是原始时代最大规模的交通活动。其中的所谓“弃其杖,化为邓林”的地方,据注《山海经》的郝懿行说,就在灵宝的东南夸父山的北面,又叫桃林,也就是古代有名的桃林塞。《山海经·中次六经》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园三百里,其中多马。”《水经注·河水》载:“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狱渚,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

根据古遗址的内涵和分布特点,最早开发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的東西向通道应当是函谷道,而崤山道

则略晚些。从古遗址的分布看,崤函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形成了7个大聚落群,除前述灵宝4个外,还有陕县(含湖滨区)、渑池仰韶村和卢氏洛河谷3个聚落群。^⑤由于灵宝东部至陕县西部属于松软的黄土区,利于石器时代人们的开发和生存,所以陕州及其以西的黄河南岸走廊河谷附近古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前5个大聚落都分布在这一区域,且聚落群与聚落群之间相对距离较近,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许顺湛先生指出:“灵宝市的4个聚落群紧密相连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东边是大王乡,与陕县的聚落群相邻,又形成一个大的聚落群体。”^⑥而这一大的聚落群体又与毗邻的关中地区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形成一个大的文化区域,文化面貌、特征具有较多的一致性。至少在仰韶文化中期,两地即为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崤函和关中地区之间冲破地理环境的阻隔,在文化面貌和特征方面具有如此大的一致性,说明两地之间居住着关系较为密切的族群,且两地之间应有一维系交往的组织。文献材料提供了有关两地进行交往的情况。黄帝部落早先生活在渭水上游的支流——姜水旁边。后来,向东部扩张和迁徙,沿着渭水、黄河南侧河岸的交通走廊,游徙于嵩山之外。《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着,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开道,未尝宁居。”黄帝从征披山通道,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灵宝铸鼎源是司马迁笔下的黄帝铸鼎铭功升天之处。近年考古发掘证明,灵宝铸鼎源亦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区域,其北面不远处即为后来的崤函古道大道。在黄帝时代,以黄帝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已经形成,黄帝部落集团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崤函、关中。在崤函西部的灵宝一带,文献记载和当地传说都表明这一地带与黄帝及黄帝部落集团有关。如《史记·孝武本纪·索隐》云:“鼎湖,县名,属京兆,后属弘农。昔皇帝采首阳山铜铸鼎于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县也。”湖城县即在今灵宝市。在陕西黄陵县一带,也有许多有关黄帝在此活动的文献材料和民间传说。《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崩,葬桥山。”《集解》引《皇览》云:“黄帝冢在上郡桥山。”《索隐》曰:“《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正义》云:“阳周,隋改为罗川。”今黄陵县尚有黄帝陵。凡此皆说明黄帝部落集团的活动中心是在崤函、关中地区,两地之间仰韶文化面貌上有较多的相似和一致性理所当然。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时代崤函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面貌与关中地区联系更为密切,而与豫中郑洛地区的区别则较为明显。苏秉琦先生将陇东—

关中—晋南—河南的仰韶文化细划为三区:即宝鸡至陕县一带的中心区,以半坡和庙底沟早期遗存为代表;东区为河南中部地区,以大河村和王湾为代表;西区为陇东地区,以大地湾为代表。他认为三区间的模糊分界是崤山和陇山。^⑦崤山是三门峡地区弘农涧河与豫中郑洛地区洛河的分水岭,也把三门峡地区与郑洛地区分割成两个独立的地理单元。^⑧安金槐先生按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独有特性,将河南境内的仰韶文化遗址划分为豫西、豫中、豫北和豫西南4个类型。其中,豫西仰韶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渑池及其以西地区,豫中仰韶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及其周围地区。而且不同仰韶文化类型所在的地区,也正是河南境内不同龙山文化类型所分布的范围。他认为不同地区文化类型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地域性差别问题,而可能与当时的族属不同有着一些联系。^⑨从崤函地区仰韶文化与关中仰韶文化的共性关系,以及它们对甘肃地区和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情况看,此时期崤函地区居民与外界交流和往来的重心显然是在西部,他们正是以黄河走廊及小支流河谷作为东西重要的交通道路,进行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的。维系两地之间交往的组织正是他们共同的族属——黄帝部落集团。研究表明,关中地区西安以东的仰韶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渭水南岸,以西又是在渭水北岸,其分布情况与目前主要道路完全符合,表现了清晰的東西交通线的特征。而文献所记黄帝及黄帝部落集团的行走路线也大致是由西向东,与考古资料所证实的函谷道时间上最早形成相吻合。因此,以黄河走廊为主体的函谷道是最早开发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的東西向通道,崤山道的开发并形成组合关系可能略晚于函谷道应是完全可信的。

崤函古道在夏商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禹是黄帝部落集团的最后一位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奠基人。《尚书·禹贡》记夏禹治水路线,其中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也就是自积石山导河,曲折到陕西、山西的龙门。南到华山的北面,再向东便到了三门峡砥柱山。传说禹在这里凭鬼斧神工,劈开拦住洪水的三道河门,使得黄河至此,分出三派,流出其间,三门峡因此而得名。文献又说,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⑩出现了通往全国九大区域的九道或九路。在禹治水期间,崤函古道得到进一步拓展,既可水行,亦可陆行,水陆兼备。禹子启即位,建立夏朝,《史记·夏本纪》记载: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启征伐有扈氏的行军路线，从东到西约起自洛（今洛阳），西行穿越崤山（今洛宁县西北），沿华山北麓然后抵于甘（今陕西户县境内）。相传夏王朝的第十四世帝王皋死后葬于崤山，后代称为南陵，今墓尚存，此地处于启征有扈氏行军走过的大道旁。《北堂书钞》卷13帝王部引《竹书纪年》说：“启征西河。”《太平御览》卷82帝王部引《竹书纪年》曰：“帝廑一名羸甲，即位，居西河。”西河，一说在今豫西与陕东之间，即河南洛阳至陕西华阴县之间。^⑪同书又引《竹书纪年》云：“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国语·鲁语》亦云：“桀奔南巢。”南巢所在，不少学者认为在今安徽巢湖一带。但据文献记载，南巢和“桀走鸣条”之地相近，鸣条即在今山西夏县一带，则南巢也当据此不远。郑杰祥认为南巢氏可能就是古代的焦国。古焦国在今三门峡市南郊，此地北距古鸣条约50公里，它应当就是夏王桀所逃的“南巢氏”又称“焦门”一地。^⑫由此可见，在夏朝时期，连接东西的崤函地区通道一直是畅通的。

与崤山南陵相对的是北陵即周文王避风雨台，地址在今陕县东硖石村东北，位于商末周文王前往商都朝歌朝奉商王的大道上。而先周与商的联系，至迟在商王武丁时期便已建立，并作为藩属国臣服于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多次载有周人纳贡于商、通婚及相互战争的事情。根据殷墟卜辞及有关文献，殷商时期，崤函地区方国部族林立，可考的有夹方（今陕县一带）、泚（今陕县）、亘方（今渑池一带）以及楚（今灵宝）、湍（今渑池）、宫（今陕县宫前）、莘（今陕县）、鬍（今陕县西北至山西平陆西南）、莞方（今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处）、卢方（今卢氏）等。^⑬这些方国与商王朝存在着臣属或战争的复杂关系，似乎从未停止过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如卢方以盛产猪和犬闻名，商王祭祀先祖大量使用卢方进贡的此类物品，并多次到卢方田猎。^⑭据彭邦炯先生的推测，商朝的主要干道有6条，其中向西方的大道是沿黄河、渭水，达于周人所在的丰镐一带。^⑮亦有学者认为，它是经洛、焦（今三门峡）、湖（今灵宝），过桃林塞，至杜亳（今西安市东南），最后达于甘。^⑯这条道路在陕县以东主要是沿着浅山梁和缓山坡上行进，较之南路河川和红土丘陵易行，因此成为殷商时期东西通道的主线。商末，周武王伐纣走的便是这条路线。胜利后，亦是沿着这条道路班师而归。后来周公东征，其兵马车卒也是通过这一道路，达到山东。这一行军路线和道路不仅成为周族从西向东主宰中原的胜利之路，而且也为东方与西土间的沟通和联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然，新石器时期和夏商时代的上述通道与后来的崤函古道走向和性质并非完全相同，但其长期使用并不断调整和更新沿线所经，使之更加适宜于崤函与邻近地区的交通，这为崤函古道的最终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应是崤函古道早期开发时期。

西周时期是崤函古道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崤函古道全面建成或初具规模的时期。周人灭商后，基于对西周首都丰镐偏于西北一隅以及伊洛地区商朝遗民的忧虑，为了稳固中央政权，也为了“四方入贡道里均”，周武王在天下初定之时，即决定另行兴建东都洛邑，开创了东、西两都制度，为此对两都间交通需求的骤增，导致了由西周中央政府直接介入，计划、有组织按一定计划、规格、布局在两都间开辟修建宽阔平直道路的兴起。这便是《诗经·小雅·大东》赞颂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中的所谓“周道”。关于“周道”一词，按字面理解，应是从周天子都城称呼开始，如果是周人自己的地方，《诗经》中的也就没有必要称呼“周道”了。既然冠以“周道”，应该是指横贯中原的一条周代古道，所以东方人将其称为周道，以区别诸侯各国新修的国道。这条周道，西起丰京、镐京，向北折东经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境），后沿黄河南岸东进经郑（今陕西华县），出桃林塞，过焦、鬲（今三门峡），最后东抵成周洛邑（今洛阳）。新修的“周道”宽阔平坦，《诗经》中称颂它“四牡騤騤，周道倭迟”。周道两旁，种植着“表道”的树木。“列树以表道，鄙食以守路”，“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⑰周政府设置野庐氏官“掌达国道，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⑱形成了经纬纵横、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道路网。《诗经》说：“唯北有斗，西柄之揭。”是说天空北面有北斗，周道像一把朝西的勺柄，连接了七星。它既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西周以前虽然有蜿蜒曲折东西通达的道路可寻，但是还没有哪一个时代（朝代）完成了横贯东西的道路建设，只有西周第一次真正有目的、有组织，按一定计划、规格、布局进行交通建设，最早完成了横贯洛阳与长安的道路建设。崤函古道的形成，不仅对于维护两京体制、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

秦汉时期，随着秦汉帝国大一统局面的建立与巩固，崤函古道进入发展完善阶段。秦以咸阳为中心，大修驰道，其中最主要的干道，就是咸阳至三川郡（今洛阳），再由三川郡分驰原关东六国旧地。秦驰道是在西周周道基础上修筑扩展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

述,秦始皇先后四次巡视东方,其中三次是经这条交通路线从咸阳东出函谷关。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长安为西京。连接长安与洛阳的东西干道,仍是沿用秦驰道,这一时期,黄河漕运的大规模兴起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展,对崤函古道有直接影响。前者使黄河漕运水路交通与崤函古道陆路交通连为一体,崤函古道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水路双轨交通结构,从此,控制了堪称帝国主要生命线的陆路粮路和水路漕路,在帝国政治经济运作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黄河漕运最大的困难在于三门峡难以克服的险阻。两汉时期进行了多次征服三门峡险阻的努力,开凿漕运栈道。从三门峡存留至今的古代漕运遗迹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修凿的栈道,还有东汉建武十一年(35)的题刻。^①黄河漕运犹如一条经济大动脉,对汉帝国的强盛和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作用。崤函古道控制着堪称汉帝国主要生命线的陆路粮路和水路漕路,在帝国政治经济运作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至此,崤函古道水陆双轨交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后者使崤函古道成为洛阳通向西域交通的首端干道,崤函古道由原来的国内通道发展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门峡市区和灵宝东汉墓葬中曾大量集中出土有胡人灯俑,俑人具有明显的胡人相貌,头戴对缝尖顶胡帽,身穿汉式右衽袍服,灯一般都顶在头上,极少数用左手揽于怀中。这些胡人灯俑一般总是成对出土,并与单只陶狗组合在一起。墓葬主主要是本地居民,胡人灯俑及其随葬陶狗的大量出现,显然是受西域少数民族、特别是粟特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②崤函古道作为东西方交通的咽喉,粟特人要与汉人经商,其足迹必定踏上过这片土地。

隋唐时代,崤函古道交通进入鼎盛时期。隋唐以长安与洛阳为东、西二都,被称为帝王的东、西二宅。在长安与洛阳之间,两地皇室成员、官吏、使臣、商贾往来络绎不绝,运输车马忙碌于道,沿途馆驿设置周全。中唐时期崤函古道沿线设有驿站约21个。长安、洛阳相距800余里,急事二日余可达。贞元二年十二月,唐德宗诏令在全国铺设驿站,同时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法律上确定了这条线路在全国交通线路中第一的地位。所谓“大路驿”的西段即我们所说的崤函古道。在隋唐全国交通网络系统中,连接长安和洛阳的驿路是当时最为繁忙的交通线,可以说这是一条轴心线。所谓“两京间驿家,缘使命极繁”,^③“来去腾腾两京路,闲行除我更无人”。^④当时的两京御道基本上是沿用秦汉驰道,只是唐代到高宗、武后以后,交通线路以北走崤

山南路为主,故南路上的行宫、驿馆也显著增多。

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持续了2000多年的长安与洛阳东、西两京体制不复存在,长安、洛阳相继降至府县,失去全国交通中心的地位,交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崤函古道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交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了缓慢发展与逐步衰落时期。宋、元、明、清历代都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整修,特别是北宋整修的规模较大,但也只限于铺垫、疏通,没有新的发展。以后对崤函古道的整修多在历来被视为危途的雁翎关(崤陵关)和硖石、石壕村一带,且多为地方官员和民众所为。因此,远不及隋唐以前两京御道(驰道)的规模。但作为全国交通道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交通干道,崤函古道仍然是受人青睐的横贯东西的大干道,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民国才逐渐被铁路所代替。

二、崤函古道交通线路变迁的记录

崤函古道东西全程约220多公里,约占唐两京路的1/2强。^⑤以古陕州(今陕县)城为枢纽,崤函古道分为东、西两段:即函谷道和崤山道。

(一)古代遗址及函谷道的交通线路

函谷道,西起潼关,东至陕州故城。以黄河走廊为主体的函谷道是最早开发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的东西向通道。自新石器中晚期开通,经西周初期修整成“周道”,函谷道畅通后,历数代而不衰。在这条古线路上发现了大量古人类活动遗址。

1. 潼关遗址

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大致设置于东汉末年,是继函谷关而起并且用来代替函谷关的。最初关址在今潼关县港口镇(旧潼关)东南原上的陶家庄至杨家庄之间,残留有南、北城墙遗迹。隋大业七年(611),移关城于今杨家庄南城北村一带,与汉代关城南夹峙,形成两座关城,形势更加险要。唐天授二年(691),潼关又从塬上北迁到塬下,沿河辟路,也就是现在的潼关旧址。宋、明两代又在唐代关城基础上整修拓建,现存的关城建于明代初年,直到1959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潼关城搬迁、废止。潼关北临渭水、黄河,南依秦岭,雄踞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当河山咽喉,成为关中东部的门户。古代都城的选择,优先考虑的条件是既利于军事防御,又便于贡赋输送,潼关是理想的“塞”与“通”的统一,既有水陆交通之利,又能对交通予以阻限,成为关中“四塞”之一,古有“潼关固则全秦固”之说。东汉以来潼关关址屡经变迁,其原因皆与控制通往关中腹地的东

西大道有关。

2. 阌乡故城遗址

在今灵宝市豫灵镇南塬村西北3华里的黄河岸边。始置年代不详,汉武帝时更名湖,属京兆尹。三国时魏废,北周明帝二年(558)置阌乡郡,隋开皇三年(583)废郡,后置阌乡县,又复湖城县,元时省湖城入阌乡,明初阌乡县治移治于唐湖城县旧址,即今阳平镇北7公里旧古湖镇城(今张村北)。1960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原阌乡城居民分别搬迁至距城3公里的塬上,称阌西村和阌东村。现存古城遗址仅有远在城内东南角的一段城墙遗迹和一座城隍庙基址,除此之外,城址内建筑所用残砖、瓦等随处可见,有的厚达数十公分。

3. 湖县故城遗址

在今灵宝市阳平镇阌西村东北约1.5公里黄河南岸,阳平河(湖水)西岸的南寨村,即唐湖城县旧址。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前614年春秋时晋侯使詹嘉处瑕。《左传·文公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史记正义》:“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远处晋之南境,从秦适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与东方诸侯远结恩好,及西乞聘鲁,亦应更交诸国,虑其要结外援东西图已,固守此扼塞,欲断其往来也。”瑕是崤函古道西段也是整个古道上设置的第一个关塞。瑕即《汉书·地理志》记载之湖,周秦时为胡关地。《汉书·地理志》:“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汉武帝时更名湖,置湖县,属京兆尹,元魏改为湖城县,元代省入阌乡。1999年,考古学者在南寨子村南王家岭发现一处秦汉时期的大型公共墓地,出土有大量战国至汉代简瓦及板瓦残片,发现带有“胡市”印记的战国晚期陶釜。另外,在南寨子村北,当地人称为周秦古道,亦叫老洛潼公路壕沟两侧高地,还发现部分夯土城墙遗迹。由此证实胡关、湖县遗址当在此地。

4. 虢州故城

在今灵宝市西区、弘农涧河西岸,包括今城关镇的解放村、建设村、西华村和东关村部分。隋大业年间将弘农郡移治虢略镇,后称凤林郡。唐初凤林郡改名鼎州,移治阌乡。贞观八年(634)将隋代所置虢州由卢氏移治于此,更名虢郡。天宝元年(742)又改为虢州。唐虢州长史岑参曾用“原驿西路挂城头,客散红亭雨未收”诗句赞美虢州城。《新唐书·崔衍传》云:“虢居华、陕间,为邮传剧道。”意思说,虢州治所是东通陕州、西通华阴、南通卢氏的三岔口。《新唐书·韩休传》亦云:“虢州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白氏长庆集》卷63《东归》诗云:“前夕宿三堂,今旦游申湖,残春三百里,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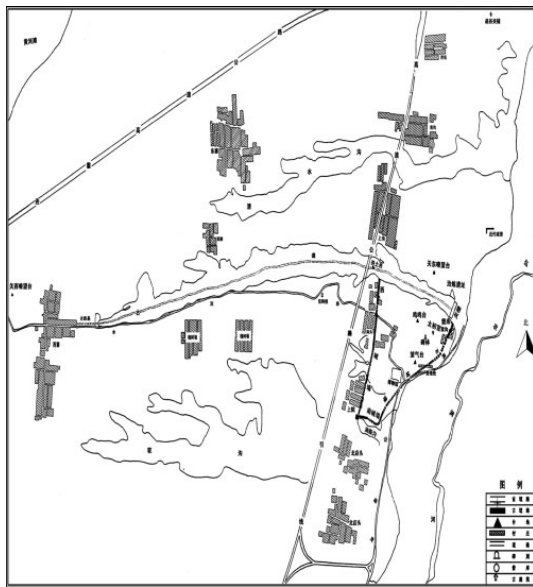
归东都。”三堂在虢州,申湖在陕州。足见州当大道,邮传冲要,通行畅达。元时降虢州为虢略县,后又省入灵宝,以虢略为镇。1959年灵宝县城迁治于此。近年在灵宝新市区建设中,在老水厂自涧河西侧向西发现有400余米古城墙基,宽5米、深3米的夯土层。在黄河路南段至黄金局办公楼区域内,发现约500米长的西城墙基、西城门墙基及建筑物。在市医院周边,也发现大面积的城墙墙基及建筑物遗迹。

5. 邑阳故城遗址

在今灵宝西北10公里西留村与岸底村中间。《水经注·河水注》:“门水又东北出邑川城南,即汉封襄门之故邑,亦曰襄门,城在函谷关南七里。”邑阳县为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废恒农、朱阳郡及玉城后所置,隋义宁年间改为邑川县。经调查,在西留村与岸底村中间黄脸沟南端,沟的南、北两侧,多处发现明显的城墙夯土层,遗址面积南北约1500米,东西约1000米。岸底村南1公里处的墙底村取名,也与此城有关。邑阳故城东临弘农涧河,正处在虢州和函谷关之间,是两处交通的必经之地。

6. 秦函谷关遗址

今灵宝市函谷关镇王垛村的梁家沟口,是历史上连接东西交通线上的一座重要关隘。现存关城依山就势而建,据近年考古勘探,关城南北长1500~1800米,东西宽1300米,北宽南窄,呈楔形。东城门位于东城中段的函谷沟口,即关道接弘农涧地。除城址北边临古道沟边,可能以沟代墙外,其东、西、南三面都分别筑有夯土城墙,墙基尚存,东北角及南墙一段保存较好。墙宽约12米,残高1~3米,多平夯,夯层厚6~8厘米。关城总



秦函谷关遗址示意图

面积约 270 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此外,在关城东门南侧发现竖井式箭库一座,在关门北侧发现汉时铸钱的陶钱范、冶炼遗址。在关内还发现了铜箭簇、瓦当、铜剑、封泥等文物。证实了这里确是周秦时期的函谷关城。

从地形上观察,函谷关古道实际上是一道沟深坡陡且距离较长的大峡谷,东西长 7.5 公里。过去一直未发现古道路基。近来在古道沟的西端南侧,距西寨村东 170 米的两道断崖处,发现有厚达 1.6 米的路基,长约 130 米,路面距现今地表深 5.6 米。据此判断,应为古道由沟底走上平地的过渡路段。路土中发现有两条明显的车辙碾轧轨迹,东西走向,间距 1.6~1.8 米,两车辙之间有坚硬的踩踏面,为人畜踩压所致,已清理出不同层次和时代的车辙印痕近 40 段。车辙凹槽宽 7~35 厘米,深 7~10 厘米。根据路土中出土的筒瓦、板瓦和绿釉陶片等遗物和地层年代,这些车辙主要是汉代和唐宋时期的。1926 年,洛潼公路修通后,这段古道才被废弃。

与函谷关古道相关的遗迹,还分别在函谷关东、西两端发现瞭望台(烽火台)遗迹。关东瞭望台位于函谷关东楼西北 215 米处的高岗上,是函谷关东大门惟一的重要哨所。建于汉代,夯土筑成,台底座近似方形,围长约 30 米,底部有一小平台,据附近发现有大量陶片判断,原土台上应有建筑设施。关西瞭望台位于函谷关镇西寨村西,台体略呈圆锥状,顶高 5.5 米,底部周长 25 米,夯土筑成,夯土中夹杂有战国时的陶片和汉代瓦片,应为西汉时所筑。关西瞭望台地处函关古道向西出关后的转弯处,这里地形复杂,道路曲折,是函谷关在军事上监控的重要地段。瞭望台设在这里的制高点上,视野开阔,黄河两岸及转折后的曲折路段尽收眼底。因此,关西瞭望台应是函谷关最西端的前沿哨所。

函谷关的始建年代,史无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学者普遍认为其设置为战国初期的秦,不晚于秦孝公时。世传老子西游至函谷关,令尹喜迎老子于此,固著道德五千言以获尹喜。今函谷关内还保留有唐代始建的纪念老子著经处的太初宫。老子出关时间不可详考,从《庄子》、《史记》等文献记载来看,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说明老子应长于孔子,思想比孔子成熟早。胡适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 570 年。”又说:“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 90 多岁罢了。”^②此说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以此而论,老子出关时间应在周敬王晚期,则此时已有函谷关存在。其实,函谷关的出现,肯定早于战国初期,但是,不可否认,战

国时代的秦国更充分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带地理形势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并着意利用函谷关一带的自然地理形势进行军事防御,在周关的基础上设函谷关。而函谷关作为关东与关中两大地域政治集团的分界标志,在秦国崛起以及与关东诸国形成对峙之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李尤《函谷关铭》曰:“函谷险要,襟带咽喉。”有些古代学者甚至以崤函之地的得失作为军事成败之决定性因素。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春秋时,崤函,晋有也,故能以制秦;秦得崤函,而六国之亡,始此矣。”无论怎样,函谷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汉元鼎三年(前 114)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③据应劭解释说其原因是,“时楼船将军杨朴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表面看,原籍新安的楼船将军杨朴是以“耻为关外民”为由而申请,并得到汉武帝的恩准后,把函谷关东迁的,其实“武帝意亦好阔”,扩展关中范围,强化京畿地区的范围能力,加强中央集权,才是迁关的主要原因。^④也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在徙关的当年又在故关设弘农县,次年,割河南、南阳二郡之西境置弘农郡,与弘农县合治,统辖卢氏、陕县、渑池、新安、宜阳等 11 县。此后,直到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弘农郡、县治一直在秦函谷关。汉代弘农郡的设置加强了对新函谷关以南之二角地带的统治,有助于更有力地控制关中东出的通道。所以,徙关后的旧函谷关地并没有因此荒废,函谷关古道仍是当时人们进出关中的主要道路。《元和郡县志》云:“今历二处而至河潼。”^⑤讲的是经秦函谷关和魏函谷关两条路可达潼关。近年在关内太初宫的南、东、北部发现大面积的旧居遗址。居民反映出土有大砖、绳纹瓦、条石等建筑构件,特别是有的地方有南北成形巷道,在东南部,碎砖瓦层厚达 1~1.5 米,东北部发现有战国和唐宋时期城市的排水陶器管道,东南边发现汉代圆形陶管道。这些设施和构件皆为战国、汉代和唐宋时期城市排水的建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关城的繁华。

7. 魏函谷关遗址

在今灵宝市函谷关镇孟村北寨北黄河南岸弘农涧河西侧。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西征,因感函谷关古道狭窄难行,于函谷关道之北 10 余里的黄河南岸边,命大将许褚别开新道,“滨大河以转运”。这条道从稠桑原东北辗转迤迤而上,至西寨与函谷关古道相合,后人称之为曹操“运粮道”。魏正始元年(240),弘农太守孟康在运粮道的入口处正式修建了关城、墙

垣、楼阁,名“大崤关”,又名“金关”。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魏函谷关。这也是继秦函谷关、汉函谷关后历史上的第三个函谷关。清康熙年间重修,民国期间毁于战火。

8. 桃林遗址

在今大王镇老城村西北黄河南岸。隋开皇十六年(596)复置桃林县,迁治北14里至弘农涧河入黄河口之东侧,后改弘农县,又复为桃林县。自此之后,该处逐渐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近水陆码头,亦为商贾云集之地。唐天宝元年(742),因于函谷关尹喜故宅掘得灵符,遂改桃林为灵宝县。桃林县的建立,与魏函谷关的设置有关。正是由于魏函谷关的设置,并逐步取代了秦关,成为东西交通的孔道,其关前地面也逐渐繁荣,为后来在关前设县奠定了基础。在灵宝老城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语:“先有三清殿,后有灵宝县。”意思是说有了魏函谷关,关前地面较开阔,邻近水陆码头,交通便利,久而久之,这里就有了居民商旅,发展为居民镇点,并建有祭祀老子的三清殿。后来建桃林县城时,即将原有的三清殿圈入城内,置于重要位置,其殿后即北城墙,殿门直对南城门。1959年前,灵宝老城城墙基本完好,西城墙与南城墙部分城砖犹存。1959年后因三门峡大坝蓄水,灵宝县城南迁至虢镇。在此之前,城墙基本完好。今仅存西城墙与南城墙部分城砖。

9. 后地故城遗址

在灵宝大王镇后地村。据清《灵宝县志》载:“在县北黄河南岸,唐武则天后东幸住辟之所,今城址尚存,俗称沙城。”经调查,该城在后地村南部,城东西长300余米,城基呈梯形状,城墙尚余部分,上宽7米,下宽10米,残高1~3米,均为黄褐土夯打而成。该城东段被村民建房时挖掉,西段为沙土淹没,东西端北面墙被黄河冲没,其北面地面留有大量碎砖、瓦片,多为唐代瓦片、瓦当。

10. 曲沃故城遗址

在今陕县大营镇黄村东北,为战国魏国之曲沃故城。面积不详,地表城垣多毁,现存黄村南天门附近夯土台基,高约3米,面积400余平方米。其北有没云台,残高约4米,长约50米,宽30米,历年发现有大型墓葬坑,出土有鼎、豆、壶、瓮等陶片和铜簇等。唐至德二年(757),唐平王出关收东京至曲沃城,而败于新店。

11. 陕州城故址

位于今三门峡市西偏北约3公里处,即今陕州风景区。早在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后又封神农氏之后和虢仲于此分别建立焦国和虢国。陕州城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旧志说建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北魏太和十一年(487)设陕州,以后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时代均为州治所在,并同为陕县县治,直至1959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废弃。陕州地势险要,其战略地位自古为人称道。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云:“陕州内屏关中,外维河洛,履崤函而戴华山,负大河而肘函谷,贾生所云崤函之固也。戴延之云其地南倚山原,北临大河,良为形势……唐之中叶,陕州尤为重地……三面险绝,攻之未可岁月下也……盖据关河之肘腋,扼四方之噤要,先得者强,后者至散,自古及今不能易也”。陕州故城是崤函古道上的枢纽,东、西两段均在陕州城交汇。历史上无论崤函古道交通线路如何变化,陕州始终是这一古道陆路和水路的必经之途。唐张九龄诗云:“驰道当河陕,陈诗问国风。川原三晋别,襟带两京同。后殿函关尽,前旌关塞通。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②薛稷诗云:“驱车赴陕郊,北顾临大河。西登咸阳途,日暮忧思多。”^③孟郊诗云:“陕城临大道,馆宇屹几鲜。”^④

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崤函古道西段——函谷道,自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早被开发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后,相继经过七次大的线路建设和调整,其中三次关隘建设属于交通线路控制工程,四次属于交通线路调整。上述古遗址都位于古道线上。因此,函谷道的具体路线是:潼关—阌乡—盘豆—湖城,之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稠桑到函谷关,南线经虢州、郃阳至函谷关,之后两道合为一股,经桃林、后地、曲沃,至陕州故城。

(二) 古代遗址及崤山南路交通线路

崤函古道东段——崤山道,因其主要线路穿行于崤山山脉之中,故而被称作崤山道。崤山道起点在陕州城故址,目的地是东向至洛阳,但在进入交口后,在具体走向上变化较大,因其所经地点不同,故而分为两道,即“崤山南路”或“南崤道”和“崤山北路”或“北崤道”。

1. 南硖石遗址

在今陕县菜园乡南县村和寺坡村一带。据《水经注》、《新唐书》等记载,该地曾为古安阳城,因地处安阳溪水(今雁翎关河)而得名。唐初置县,本名崤县,贞观十四年(640)移治距南县村东南六七里的石门——古硖石坞,改名硖石县。据观察,南县村的隋唐文化层沿今三洛公路长约800余米,宽500余米,断崖处偶可见夯土墙基,城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至今当地群众仍可指示其城门和街道的位置,河水北岸一处废弃的窑洞顶部暴露有一层铺地方砖,似为当时衙署所在地。地表散存有布纹大瓦、黄釉瓷片等。

在寺坡村后山坡上一坍塌庙宇遗址上发现有一通唐碑,碑阳刻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为唐朝散大夫行陕州县令上柱国敬仁玄及其妻樊氏造立,时间是“大周长寿元年(692)九月廿三日”。碑阴则为“新修敬府君真形之碣”,是后人为纪念敬仁玄而镌刻的“新修大通寺阁下故硖石县令敬公真形之碣并叙”,碑文16行,行约40字,“长城陈用海字明道撰”,字稍有漫溢,但仍可达句不失其意。立碑时间为“大唐开元元年(713)七月廿三日”。说明唐代大通寺就在今寺坡村,进一步证明了唐硖石县所在。

2. 绣岭宫遗址

在今陕县菜园乡石门村南的绣岭坡上,唐显庆三年(658)置,面积约500平方米。遗址内出土有唐代布纹大瓦等物。距绣岭宫遗址北约200米处,有一扁平圆丘状墓,俗称“公主坟”,面积约50平方米,冢高3米,当地群众指其为唐玄宗幼女墓。

3. 雁翎关旧址和夏后皋墓

关址位于陕县菜园乡与宫前乡交界处,雁翎关村东南,是崤山南路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当地人称其为崤陵关,后因口语有讹,讹传至今,通称雁翎关。夏后皋墓在关西北附近一山巅上,墓呈圆丘形,高约1.5米。相传夏朝第十四代帝王夏后皋在此关附近与敌对部落战死后葬于此。

雁翎关设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据《水经注·河水注》和夏后皋墓位置,设关的时间应是比较早的,判断应在夏末。

4. 唐兰峰宫遗址

在今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许多著作称其为“武则天行宫”或“紫微宫”、“兰昌宫”、“崎岫宫”。但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兰昌宫在福昌县,即今宜阳县境内,崎岫宫在永宁县西5里。按史籍记载,从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与实地考察,此宫应是唐代的兰峰宫。

兰峰宫遗址面积约6000平方米,今为耕地,宫室坐北面南,北依万岁山,南对南唐山,东、西两侧各为一条南北沟所限,遗址内曾出土圆形、方形石柱础,铺地素面方砖等,这些石柱础及方砖分散存放在宫前村群众家里,是他们在遗址上耕作时采集的。至今残留的唐代筒瓦残片、长砖等在田间地头俯拾皆是。据当地群众反映,每年初夏小麦将要成熟时,站在万寿山上,俯瞰宫坪小麦长势和颜色不一,长在宫殿室宇地基上的小麦因地下基础土质坚硬,水分少,小麦长势浅而瘦;宫殿屋室之外的地方,土层深厚,含水量充足,小麦长势好,颜色浓绿。由此大体能辨识出当年的宫室的建筑轮

廓,宛如一幅城市平面图,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错落有致。宫前村也因此而得名。

5. 莎栅城和莎栅道

隋大业元年(605)“废二崤道,开菱册道”,后称莎栅道,其后屡有兴废,贞观十四年(640)复开。莎栅道的开辟是崤山南路交通线路的一次重大变迁。莎栅道起于哪里,经过哪里,又到哪里,历来说法不一。

2008年5月,我们随李健超先生进行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对此道有了新的认识。据文献记载,贞观十四年开莎栅道时曾移永宁县于莎栅。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永宁县西五里有崎岫宫,县西三十三里有兰峰宫,皆显庆三年置。”于此可知兰峰宫在永宁县西33里,即今陕县宫前乡宫前村北。莎栅城在永宁县西30里,则莎栅城在兰峰宫东3里。

崤山南路历来的路线是从陕州东南沿青龙河谷至唐硖石驿(今陕县石门水库,即硖石坞),再溯雁翎关水越雁翎峡谷沿源于此地东流之永昌河至三乡驿(今宜阳县三乡镇),再顺洛河东去洛阳。但永昌河从兰峰宫东向东大致沿纬度线方向约20公里至龙脖水库大坝,又东南沿永昌河至今宜阳县三乡入洛河。永昌河从柳树沟至龙脖水库间曲流发育,即弯道多。从永昌河起点到注入洛河,大体上是西北东南向弯曲的“弓背形”。

莎栅道起自永宁县城西30里莎栅城,即兰峰宫东3里,东南行经今池头、头峪后入洛宁县境到旧县村,又东南经今照册村,沿河谷东经大宋(东宋)抵三乡驿。新开莎栅道既东南斜行近乎直线走向为“弓弦”,自然道路便捷,减少路程,再加以避免曲流,又减少路程,量算莎栅道比古崤山南道减少路程约20余里。再者莎栅道从起点到鹿桥驿,大体沿黄土丘陵原面或小分水岭,道路比较平直(高差不大)。这样莎栅道既便捷又较为平坦,所以自唐贞观十七年之后从陕州东南至洛阳的大道就改为莎栅道,而崤山南道就废弃了。由此不难看出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后,从莎栅城沿莎栅道,并移永宁县城于鹿桥,这就是莎栅道。路线是莎栅城(驿)、永宁县城(鹿桥驿)、三乡驿。此后唐高宗显庆三年,又于莎栅城西三里置兰峰宫、鹿桥驿西五里置崎岫宫。兰峰宫至崎岫宫也约为30里,即当时在山区行走的一日程。

6. 安国寺

在今陕县西李乡东南约6公里元上村西。始建于隋,自唐迄清历代多次敕封,屡经修葺。面积约5000余平方米,有房60余间。安国寺北依瑞云山,南临永昌河,莎栅道开通以前,这里是崤山南路的必经之地。在其周围,有不少隋末瓦岗军领袖李密等的活动踪迹。

7.空相寺

在今陕西西李乡陡沟村北,亦名定林寺。始建于北魏,为中州四大名寺之一。唐代改称空相寺。近年在寺内出土有唐大中十二年(858)所立《汾阳王置寺表碑》,记述汾阳王郭子仪修复被安史之乱毁坏的定林寺,唐代宗敕改空相寺事。

以上遗址均位于今陕县县境。此外,在今洛宁、宜阳县境内还有唐永宁县城故址、战国宜阳城故址、唐福昌县故址、隋唐寿安城故址等古遗址,它们均是崤山南路交通必经之地。因此,崤山南路的具体线路是:从陕州城出发沿青龙涧河东南行,经交口,溯青龙涧河支流雁翎关河(安阳溪水)穿崤山,经南陝石县、绣岭宫,越雁翎关,过兰峰宫、安国寺,沿洛河支流永昌河东南行,循洛河谷地,经洛宁旧县、宜阳北上到洛阳。

(三)古代遗址及崤山北路交通线路

1.张茅董达桥遗址

在今陕县张茅乡张茅村村东,建于五代,毁于20世纪60年代公路改建时,为崤函古道北道必经之香油河(据《水经注》所述,似为崖水)上建筑物。

2.北陝石遗址

在今陕县陝石乡陝石村。该村东西狭长,四面皆为崤山环绕,一条道路从村中通过。当地群众称其为老路。唐武德三年置陝石县于此,宋乾德五年移治,熙宁元年(1068)省为石壕镇,后又改为陝石关、驿所。北陝石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地表城垣已不存。据当地群众讲,早些年地表上还散存有板瓦及黄釉、黑釉、白釉瓷瓶、壶、罐、碗等。断壁处偶见夯土层。城外崤水两侧岸边发现有唐宋文化遗物,附近石料场和采石场一带发现有唐宋墓群。陝石北面的三嘴寨等处为北宋晚期石壕尉李彦仙与金兵对垒处,陝石东2.5公里处即北崤道石壕古道遗存。

陝石还是诗人杜甫著名的《石壕吏》的诞生地。《全唐诗》卷217杜甫《石壕吏》本注:“陕县有石壕镇。”自北宋以来都认为《石壕吏》作于石壕镇。石壕镇在宋初已有,有《宋会要辑稿》及《宋史·地理志》可证。但在唐代这里尚未设镇,县下大量设镇是在宋代以后。所以,在杜甫经过此地时,石壕还只是单称石壕,或石壕村,而不称镇。后人将《石壕吏》说成是在今石壕村所作有误。

3.文王避雨台

即春秋时期所谓的北陵,在陝石村东街北,为一长约50余米、高约8米的石坎,原有柏树、庙宇、八卦琉璃井、石刻碑碣等,1965年前后被毁,现已辟为耕地。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崤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

4.石壕古道遗迹

新近发现的石壕古道位于陝石乡石壕村西南的山坡上,西距陝石村2.5公里,北距石壕村2公里。古道的东端接一山沟,北端与1920年前后修筑的洛潼公路相重合,一部分被洛潼公路或破坏或叠压。现存的古道遗迹位于山坡中部,夹在两小山包之间,石板路面,保存较好,系借助于山坡中部自然形成的岩石上修筑,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230米,按走向可分为三段。古道最宽处8.8米,最窄处5.2米。古道上遗留的车辙印痕有一车道(二条车辙印痕)、二车道(四条车辙印痕)和三车道(六条车辙印痕),其中,一车道是主车道,二、三车道为会车辅道。车辙印痕宽窄不等,深浅不一,最宽处0.4米,最浅处仅有数厘米,最深达0.41米。车辙印痕外宽一般1.32米,最宽处1.56米,最窄处1.06米。

此外,在古道北坡下和坡顶路两侧还发现有三个坡池,是人们利用自然形成的坑凹地形并在此基础上略加整修而成的蓄水设施。

石壕古道地处崤函古道之腹地,历史上著名的秦晋崤之战,杜甫《石壕吏》诗内记述的悲惨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据考古资料,战国时期,韩国境内的车轮轮距为1.06米,秦代的车轮轮距是1.5米,汉代车轮轮距则为1.32米。石壕古道现存车辙印痕的外宽一般为1.32米,最窄处1.06米,最宽处1.56米。据此可以断定,石壕古道在战国时期及以后都在长期使用,当在民国初期以后废弃。

5.石壕村

从石壕古道向东约2公里,抵石壕村。古道原本从村中通过,俗传名称尚有老路壕、古路壕,村东道路上亦有车轮碾轧石板形成的车辙印迹,后修路拓宽时被毁。据该村老年村民讲,村中道旁原设有茶亭,亭旁有碑数幢,今已失散无存,记述内容当与道路有关。该村本称干壕或甘壕、兴隆镇,即《西征道里记》中的乾壕,也是后唐潞王清泰元年潞王东入洛阳所经之地。后该村村委因《石壕吏》一诗,将村名改为石壕村。

6.观音堂

即崤陵镇故址,距石壕村4公里。据清嘉庆二十年(1815)重修观音大寺和关帝圣庙所立石碑记载,观音堂古称崤陵镇,因西依崤陵而得名。明嘉靖年间,灵宝书生徐阶在此建造观音大寺后改名。观音堂街上原建有观音大寺和关帝庙,寺内有鼓楼和钟楼,分立南、北

两侧,为三层六面带斗拱的砖木建筑,其上各有10米高的铁斗旗杆。鼓楼毁于1968年,现仅存钟楼。寺院旧址现为一学校占用。

7.北山高道

东汉末曹操“更开北山高道”,是崤山道一次重要的线路变化。北山高道指在崤山北路之北另开的山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一直没有人能准确做出复原路线。胡德经先生在《两京古道考辨》考证说:这条道路自今新安县铁门西北,至灵宝稠桑原,全长293华里。这一复原影响很大,至今被许多人引用。但具体也有疑问。辛德勇先生在《崤山古道琐证》一文中,根据历史文献,将北山高道走向复原为:从盘崤山西侧即今硤石西开始离开旧路,向东则至千崤水,沿千崤水谷地上溯南行,至千崤山下与旧路合。北山高道只是曹操为避开“南路之险”而别开的一段短距离道路,否则,无法解释曹操的“更开北山高道”的目的。今观音堂煤矿(矿务局)傍兴隆涧河(清水河),从观音堂煤矿沿兴隆涧河北上,行十二三公里,河面豁然开朗,硤石河自西南而来汇入兴隆涧河,前行,河面开阔约6公里至弥陀寺。该寺位于柴洼乡柏树村北,始建年代不详,原寺建筑规模较大,现存建筑均为清代重修。据当地群众讲,当年这里较繁华,从兴隆涧河北上的行人在此停留。弥陀寺北面便是柏树山、刘家山,山北侧有道路通支建煤矿、庙沟。兴隆涧河至张上村注入黄河。在硤石西一带似只有兴隆涧河一带地理环境与辛德勇先生复原的北山高道线路地理环境相似。那么,推测当年北山高道是否为沿今兴隆涧河河谷北上欵,因课题时间所限,有待进一步调查。

民国《陕县志》卷19《南北二崤道》,称曹操所开北道“当自宫前以西,北通硤石至陕州”。这也是一些地方史志中称崤山南路至宫前蔡家湾一分为二,其中一条沿太子沟北上至硤石的所谓高道之所本。雁翎关是崤山南路最为险峻的一段,硤石、石壕则是北路最为险峻的地段,雁翎关虽然险峻,但通过后即进入了青龙涧河谷,地势较缓,道路易行,且距陕州仅约26公里,比硤石距陕州的距离少二三公里,加上北上的路段,则更长。既然已经好不容易通过了雁翎关,又有什么理由再折而北上走更为险仄的硤石路呢?这样既险仄而又迂远,是违背常理的。实地调查,从蔡家湾北上,经太子沟,的确有路可通,但道路设计总是选择易行而不费力的地方,古今如此,不会自找麻烦在通过一段险峻道路又有路可走的情形下再折而选择走另一段险峻且距离更长的路。

8.渑池故城遗址

在今渑池县城西池底乡朱城村,面积约3.78万平方米。为战国时秦赵会盟之地,亦称俱利城。秦汉时期,曾为渑池县治及北魏、东魏时期之俱利县城。现地表城垣不存,经调查,在城址内曾出土有战国简瓦、板瓦等建筑构件残片,并有人捡到铜镞等遗物。唐贞观元年后渑池县城移治双桥(即今城关镇),沿用至今。

9.新安故城遗址

在今义马市千秋镇石河村,始建于战国时期,西汉初置县。北魏、东魏和西魏时的西新安县治亦在此。隋大业元年(535),渑池县移治新安古城,后移治大坞城(今渑池县西阳乡崤村沟附近)。城址平面为长方形,长690米,宽600米,面积40万平方米。今地表城垣已毁,断崖处偶可见夯土层。城内曾发现铺路石、铁簇、五边形陶器水管道,大量秦汉简瓦、板瓦及陶器残片。城西南二十里铺李杏湾村有“楚军坑杀秦卒处”,秦末项羽坑杀秦降卒20余万于此,俗称“楚坑”。

10.鸿庆寺石窟

在今义马市常村镇石佛村西,开凿不晚于北魏景明年间,是中原地区北魏中小型石窟的杰出代表。唐代有续建,以后各代均有重建。鸿庆寺原名大德寺,武周圣历元年(698),安乐公主亲临,观此佛境,改名鸿庆寺。目前寺院建筑已经不存在,只有石窟及部分建筑遗址尚存。石窟寺现存洞窟4个,有佛龕46个,大小造像120余尊,浮雕佛传故事4幅。

以上遗址均位于今陕县、义马和渑池县境。此外,在今新安县境内还有汉函谷关、唐新安县城等。因此,崤山北路的具体线路是由陕州城故址,沿涧河河谷东行,经今交口、张茅、硤石、石壕、渑池、义马、新安,至洛阳。

(四)隋唐行宫、古驿馆及崤函古道交通线路

崤函古道是隋、唐时期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最重要的东西交通干道,隋、唐两代诸帝特别是唐太宗、唐高宗、武后、唐玄宗经常通过崤函古道往返于长安和洛阳。洛阳与长安相距800余里,帝王们往返长安和洛阳,一般要经历数旬的时间。为了沿途驻蹕方便,隋炀帝时“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③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也曾为两京路行宫各造殿宇及屋千间。^④隋、唐时期长安与洛阳两京道上行宫的数量、地点及置废情况,诸学者的研究多有差异。^⑤崤函古道上究竟有多少座行宫,考诸文献和实地调查,隋、唐在该道沿线设置的行宫应为16所,由西向东为序分别为函谷道上的别院宫(轩游宫)、上阳宫、桃源宫、武则天行宫、弘农

宫(陕城宫),嵕山南路上的绣岭宫、兰峰宫、莎册(柵)宫、崎岫宫、福昌宫、兰昌宫、连昌宫、兴泰宫,嵕山北路上的紫桂宫。(见表1)

综上所述,史籍可考的嵕函古道上的隋唐时期行宫约有16座,其中轩游宫、上阳宫、陕城宫、福昌宫、显仁宫5座创建于隋代,唐代另创新建了11座。16座行宫中,兴泰宫、紫桂宫是避暑宫,其他14座属于两京道行宫。正如诸学者所指出,在16座行宫中,嵕山北路仅有一个泚池的紫桂宫,而南道则有绣岭宫、兰峰宫、莎

册(柵)宫、崎岫宫、福昌宫、兰昌宫、连昌宫、兴泰宫、显仁宫、甘泉宫、连曜宫11宫。^④可见当时道路之主次。在这16座行宫中,主要集中在阌乡、湖城、灵宝(此三座行宫亦可视为在今灵宝一地)、永宁、福昌和寿安等地。其建造年代以唐高宗时期最多,其中又以显庆年间为最,玄宗时期主要是增建。这一时期也正是唐皇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最频繁的时期。唐代行宫在安史之乱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唐代以后鲜见于文献记载。这种现象,显然与嵕函古道交通发展及功能演变存在偶

表1 隋唐嵕函古道行宫16所)

名称(别称)	地点	置废年代	资料来源
轩游宫 (别院宫)	虢州阌乡县(今灵宝西豫灵镇一带)	隋—唐末	《新唐书》卷37《地理志》
上阳宫	虢州湖城县(今灵宝东北阳平镇一带)	隋—唐末	同上
桃源宫	陕州灵宝县(今灵宝大王镇后地村西南)	唐高祖武德元年—唐末	同上
陕城宫 (弘农宫)	陕州陕县 (今陕县故城内)	隋—唐末	《新唐书》卷38《地理志》、 《大清一统志》卷220《陕州》
绣岭宫	陕州硤石县(今陕县菜园乡绣岭村)	唐高宗显庆三年—唐末	《新唐书》卷38《地理志》
兰峰宫	河南府永宁县西三十里(今陕县官前乡官前村北)	唐高宗显庆三年—唐末	同上
莎册(柵)宫	河南府永宁县 (当在莎柵城)	唐初	《全唐诗》卷35许敬宗《侍宴莎册宫应制得情字》诗、《寰宇记补阙》卷4《河南道》
崎岫宫	河南府永宁县西五里(今洛宁县旧县村西五里庙圪塔)	唐高宗显庆三年—唐末	《新唐书》卷38《地理志》
福昌宫	河南府福昌县(今宜阳三乡东连昌河入洛河附近)	隋—唐末	同上
兰昌宫	河南府福昌县西十七里(今宜阳县三乡乡南寨村)	唐	同上
连昌宫	河南府寿安县西二十九里(今宜阳县三乡村北五花寺)	唐高宗显庆三年—唐末	同上
兴泰宫	河南府寿安县西南四十里万安山(今宜阳赵保乡西赵保村上沟村与下沟村间)	武周长安四年—唐中宗神龙元年	《旧唐书》卷6《则天本纪》、 《新唐书》卷38《地理志》
显仁宫	河南府寿安县 (今宜阳县西)	隋大业元年—唐初	《隋书》卷30《地理志》、 《通鉴》卷180
甘泉宫	河南寿安县东 (今河南宜阳)东	唐初	《通鉴》卷188
连曜宫	河南寿安县 (今河南宜阳)	唐初	《南部新书》戊
紫桂宫 (避暑宫、芳桂宫)	河南府泚池县 (今泚池县黄花村)	唐高宗仪凤二年—弘道元年	《新唐书》卷38《地理志》

表 2 崤函古道古驿馆

名称(别称)	地点	资料来源
潼关驿 (关西驿) ^⑤	在今潼关旧城	《旧唐书》卷 104《封常青传》、《资治通鉴》卷 218、《全唐诗》卷 528 许浑《行次潼关题驿后轩》、卷 529《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卷 531《秋霁潼关驿亭》、卷 548 薛逢《潼关驿亭》、《资治通鉴》卷 218、《全唐诗》卷 678 吴融《关西驿亭即事》
阌乡驿 (阌乡逆旅)	县设驿，在今灵宝豫灵镇南源村一带	《因话录》卷 3、《太平广记》卷 314 引《河东记》
盘豆驿 (盘豆馆)	阌乡县盘豆，在今灵宝市故县镇盘东、盘西二村所处原下，已为黄河淹没	《全唐诗》卷 317 武元衡《使次盘豆驿望永乐县》、卷 325 权德舆《盘豆驿》、卷 540 李商隐《出关宿盘豆驿对丛芦有感》
湖城驿 (湖城逆旅)	县设驿，在今灵宝市阳平镇阌西村东北约 1.5 公里黄河南岸，阳平河西岸王家岭北南寨子村	《全唐诗》卷 354 刘禹锡《秋晚题湖城驿上池亭》、《酉阳杂俎前集》卷 15《诺皋记》下、《太平广记》卷 38
稠桑驿	在今灵宝市函谷关镇稠桑村	《新唐书》卷 84《李密传》、《全唐诗》卷 200 岑参《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卷 448 白居易《小白马乘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卷 455《往年稠桑驿曾丧白马题诗亭壁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太平广记》卷 160
桃林驿	县设驿，在今灵宝老城，大王镇老城村西北黄河南岸	《新唐书》卷 84《李密传》、《全唐诗》卷 344 韩愈《桃林夜贺晋公》
荆山馆	湖城、弘农间（一说在阳平镇张村）	《太平广记》卷 416
柏仁驿 (虢州公馆)	虢州弘农县驿，今灵宝市	《全唐诗》卷 198 岑参《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北梦琐言》卷 9
红亭	今灵宝市西 1 公里西华村塬上	《全唐诗》卷 200 岑参《虢州西亭陪端公宴集》、卷 201《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卷 201《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
甘棠驿	县设驿，治所之南，今陕州故城内	《全唐诗》卷 359 刘禹锡《送王司马之陕州》、《北梦琐言》卷 9、《旧五代史》卷 82《晋少帝纪》
硖石驿	今陕县菜园乡石门	《李文公集》卷 13《傅牺弼神道碑》、《资治通鉴》卷 249
嘉祥驿	陕州以南、三乡以北	《全唐诗》卷 557 孟迟《题嘉祥驿》、卷 566 卢渥《题嘉祥驿》、《太平广记》卷 168 引《卢氏杂说》
鹿桥驿	今洛宁县旧县村	《资治通鉴》卷 222
三乡驿	今宜阳县西三乡	《全唐诗》卷 356 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卷 726 陆贞洞《和三乡诗》、《全唐文》卷 923 王太瀚《元珠录》
福昌馆	今宜阳县西福昌	《全唐诗逸》绍伯《题福昌馆》
柳泉驿	今宜阳县西北柳泉	《资治通鉴》卷 222、《南部新书》乙
甘棠馆 (寿安南馆、寿安水馆、寿安山馆)	县设驿，今宜阳县城内	《全唐诗》卷 364 刘禹锡《题寿安甘棠馆二首》、卷 523 杜牧《题寿安县甘棠馆御沟》、卷 596 司马扎《宿寿安甘棠馆》、卷 297 王建《题寿安南馆》、卷 561 薛能《寿安水馆》、卷 645 罗邺《春日过寿安山馆》
三泉驿	今宜阳县城东 25 里苗马村	《全唐诗》卷 421 元稹《三泉驿》、《太平广记》卷 348 引《传异记》
芳桂宫驿	今渑池西五里黄花村	《旧唐书》卷 185《韦机传》
渑池南馆	今渑池县城内	《河朔访古记》卷下《唐卢元卿渑池县南馆记碑》
新安驿	今渑池县搭泥街，一说在今新安县	《太平寰宇记》卷 5

合关系。

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崤函古道驿馆建设。汉代在崤函古道西段今灵宝境内设置的“亭”,可考者即有柏谷亭、^⑤曹阳亭^⑥。在经历了先秦驿馆制度的萌芽和制度化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与完备化时期后,到隋唐时代,崤函古道的驿馆设置呈现鼎盛的局面,成为一条交通设施完备,信息传递通畅的驿道。据统计,中唐时期崤函古道沿线大约设有驿馆 21 个。(见表 2)

上述 21 所驿馆,当然不是中唐时期崤函古道上驿馆的全部,如灵宝、陕县间,文献记载中无有驿馆,据《括地志》载:“曲沃古城,在陕县西南三十二里。”而新店更稍西些,就地望而言,曲沃、新店必有置驿者,^⑦惜因缺载,不得而知。在这 21 所驿馆中,崤山南路共设置驿馆 18 个,而北路所设驿馆仅 3 个,这三个驿亦非常设。隋唐行宫及驿站的设置,再次证明了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走向及运营状况。

三、三门峡漕运航道——崤函古道特殊的道路系统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陆路交通外,崤函古道还包括三门峡漕运航道以及为保证航道畅通而凿修的人工栈道。栈道西起三门峡的人门栈道,东至渑池县与新安县交界处的“八里胡同”。考古学者曾对此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勘察,证明三门峡黄河漕运航道是一个包括三门峡及其以下“百二十里”河道、工程规模巨大、时间跨度长、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三门峡漕运航道实是陆路崤函古道的另一种形式,是陆路交通的延伸和补

充,二者相互贯通和联结,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三门峡黄河漕运也应包括在崤函古道的范围,崤函古道自古以来就是水陆“双轨”之途。理解这一点,对科学认识崤函古道乃至开发和利用崤函古道都是十分重要的。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

四、结语

崤函古道是我国古代沟通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东西干道的一支,兴盛于周秦汉唐时期。崤函古道介于两大古都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与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使其成为长安与洛阳东、西两京之间沟通和交往不可或缺的中间地带和主要通道,同时又是东进中原、西出关中的门户和中原王朝锐意经营的黄河漕运上的重要中继站,在古代都城地域结构和运作空间以及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丝绸之路河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崤函古道及函谷关等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如今,崤函古道的绝大部分路段都已消亡或迷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后世道路叠加在前代道路上,如 310 国道、陇海铁路、连霍高速以及各省道、县道、乡道等都或多或少地穿行在古道之上,掠去了古道曾有的“东西锁钥”的风采。然而,作为曾经承载了极其厚重的历史,拥有极其丰富文化内涵的崤函古道,其沿线的遗存与景观,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研究和保护。

[注 释]

- ①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辛德勇:《崤山古道琐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 4 期;王文楚:《唐两京驿路考》,《历史研究》,1983 年第 6 期;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 1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 年第 2 期。
- ②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 年第 2 期。
- ③《河南文物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8 年版。
- ④《河南文物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8 年版;《陕西文物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8 年版;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 年第 5 期;《河南龙山文化聚落群研究》,《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中原文物》,2002 年第 4 期;李友谋:《论郑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相

- 互关系》,《中原文物》,1992 年第 3 期;杨亚长:《试论“华渭文化区”》,《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4 期;《略论“郑洛文化区”》,《华夏考古》,2002 年第 1 期。
- ⑤⑥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 年第 5 期。
- ⑦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5 年特刊。
- ⑧马程远:《豫西山地貌的发育和分区》,《河南师大学报》,1982 年第 1 期。
- ⑨安金槐:《对河南境内仰韶文化的浅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5 年特刊。
- ⑩《史记》卷 2《夏本纪》。
- ⑪西河地望有多种说法,除今豫西与陕东之间说外,还有在今山西夏县东下冯、河南内黄县内、滑县和浚县一带、豫北东部和山西汾阳境内等说法。

- ⑫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3 页。
- ⑬李久昌:《远古至西周时期虢国地区的人文环境及其演进特点》,《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 ⑭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9~201 页。
- ⑮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9 页。
- ⑯郑葵葵:《中国古代交通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6 页。
- ⑰《国语·周语》。
- ⑱《周礼·秋官司寇第五》。
- ⑲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 ⑳胡国强:《河南三门峡地区胡人灯俑》,《中原文物》,2008 年第 4 期。
- ㉑《全唐文》卷 27 玄宗《简察驿路妄索供给诏》。
- ㉒《全唐诗》卷 448 白居易《京路》。
- ㉓崤函古道东西全程约 200 多公里。崤函古道的里程,史籍没有记载。《元和郡县志》卷 6 记陕州西至潼关 200 里。《太平寰宇记》卷 6 记陕州西至华州华阴界 225 里,界在潼关东,两说略异。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此因所取之路线而异。陕州以西经虢州,共约 225 里,不经虢州则约 200 里。陕州东至洛阳里程,《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皆记 350 里,《旧唐书·地理志》记 300 里。前者是指经宜阳之里程,后者是指经渑池之里程。《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427 记洛阳西南至陕州 340 里,西至陕州 300 里,其中,西南至宜阳 70 里,西至新安 70 里,与唐宋史籍所记里程大致相合。则由陕州东至新安为 230 里,而由陕州东南至宜阳为 270 里。如此,诸书所记崤函古道里程,以四百六七十里最为标准。严耕望先生称,长安、洛阳间里距,以八百五六十里最为标准,则崤函古道里程约占唐两京驿路的 1/2。
- ㉔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 页。
- ㉕《汉书》卷 6《武帝纪》。
- ㉖韩·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2 期。
- ㉗《元和郡县志》卷 2《华州》。
- ㉘《全唐诗》卷 48《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
- ㉙《全唐诗》卷 93《秋日还京陕西十日作》。
- ㉚《全唐诗》卷 378《寄陕府邓给事》。
- ㉛《贞观政要》卷 10《巡幸》。
- ㉜《唐会要》卷 30《杂记》。
- ㉝严耕望先生统计唐代设置在洛阳与长安两京道上有 15 所(《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介永强统计唐代也是 15 所(《唐代行宫考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 年第 1 期),但名称等与严先生有所不同;吴宏岐先生统计,隋时两京道上有行宫 11 所,唐时增至 18 所(《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2 期);严辉先生说,隋唐在两京大道上设立的行宫大约共有 17 处(《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调查与考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 ㉞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云南路有 8 座行宫;吴宏岐:《隋唐帝王行宫的地域分布》,云南路有 9 座行宫。
- ㉟《水经注》卷 4:“河水又东,合柏谷水,水出宏农县南石堤山。山下有《石堤铭祠》云:魏甘露四年,散骑常侍、征南将军、豫州刺史领宏农太守、南平公之所经建也。其水北流,迳其亭下。晋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汉武帝尝微行此亭,见馈亭长妻。故潘岳《西征赋》曰:长傲客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谓此亭也。”于此可知,柏谷亭在柏谷水下游。柏谷水即今沙河,发源于今灵宝阳平镇南秦岭,东北流经西闫西坡村入黄河。《水经注》云:“其水北流,迳其亭下。”则亭当在西闫乡一带。今西闫乡大字营北有岭古称柏谷岭,柏谷亭当在沙河西岸柏谷岭下东古驿村一带。
- ㊱《水经注》卷 4:“河之右,曹水注之。水出南山,北迳曹阳亭西。陈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斩之于此。魏氏以为好阳。《晋书地道记》曰:“亭在弘农县东十三里”。(守敬按:《续汉志》,弘农有曹阳亭。《汉书·陈胜传》注,晋灼曰:“亭在弘农东十三里”。为《晋书地道记》所本。《括地志》,在桃林县东南十四里。《元和志》,在灵宝县东南十四里。《灵宝县志》,曹阳亭即今好阳铺,在县东十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于此可知,曹阳亭即后来的好阳铺,当在今好阳河东,大王镇西五帝村附近。
- ㊲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关西驿即潼关驿,盖潼关驿在关之西,故名,非别一驿也。
- ㊳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